

# 第一章

## 早期英语散文的形成 和发展

\*\*\*

## 第一节 现代英语散文的起源问题

首先，有必要大概追溯一下现代英语散文史的起点。这是一个英语散文史家各执一词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叙述几个世纪的英语散文史之前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著名学者、伦敦大学学院教授钱伯斯（R. W. Chambers）在其《论英语散文的连续性：从艾尔弗雷德到莫尔及其学派》（*On the Continuity of English Prose from Alfred to More and His School*）一书中有经典之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477-1535）是现代英语散文史的起点。这里，钱伯斯基本遵循19世纪英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和文学史家亨利·哈勒姆（Henry Hallam, 1777-1859）等人的思路 and 观点，即认为莫尔是“现代英语散文之父”。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术界对托马斯·莫尔的宗教立场、政治观点和文学地位多有争论，而钱伯斯却在文学领域坚决捍卫莫尔对于英语散文史的先驱价值，对其散文语言和文体多有美辞。在钱伯斯看来，莫尔的英语散文，尤其是历史著作《理查三世的历史》（*History of King Richard III*），是“英语的典范，精选的语言，纯净而准确，没有下里巴人气息，也没有书卷气”。据此，钱伯斯坚定地认为：莫尔的英语散文最接近当时普通英国人的语言，“他是生成有价值的英语散文的第一个英国人”，因为他的英语散文“适合他的时代的一切用途：有雄辩的力量，有戏剧性，多样化”。钱伯斯对莫尔的称赞是全面的：“莫尔写的英语散文，不论是议论还是叙事，不论是仔细推敲建构出来的片段，还是连续的滔滔雄辩，对话中不论是脱口而出的嬉笑怒骂，还是斟酌再三、近乎委婉的言辞，他都写得好。其中不少地方，他的英语散文都堪称典范。”<sup>1</sup>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莫尔的时代是一个古典文化复兴的时代，莫尔本人是当时政

---

1 关于钱伯斯对莫尔的评价，参见Chambers, R. W. *On the Continuity of English Prose from Alfred to More and His Schoo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界和教坛的精英分子和头面人物，又是一个偏好古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的人文主义者、政治法学家和笃信天主教的圣徒。他在 16 世纪初就能写出如此“完美”的英语散文，这是一件颇令英国人，特别是 19 世纪大英帝国鼎盛时代，充满民族荣耀的英国学人在回望英语文学传统时深感自豪的事。

我们知道，19 世纪中叶，英国文学研究挟工业革命之势和新兴的大英帝国意识形态而兴起，英国大学里相继建立英语文学学科，逐渐确立了英国文学的学术地位。文学史学者们于是可以依托大学教育体制，追溯英国散文的久远历史，弘扬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在此社会文化氛围中，像麦金托什和哈勒姆这样激进的法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们应大英帝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召唤，对人文主义政治家和天主教圣徒莫尔的英语散文风格大加赞赏，应是情理之中。在那个时代的英语文学史家的眼里，政治的、社会的用途和文学的价值是衡量英语散文优劣的基本尺度。莫尔是文艺复兴时期受古典文化浸润很深的法学家、政治家和人文主义者。他偏爱用拉丁文写作，写了不少政论著作，包括他那传世之作《乌托邦》(*Utopia*)。当然，他有时也用英语写历史，写诗歌和散文，语言通俗流畅，思想广博而行文幽默，文采多于判断，戏剧性胜于史实性。在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史家看来，这些语言和文学特质正是朝气蓬勃的、充满进取的大英帝国时代文化精神的根源，也就自然代表着现代英语散文良好的开端。如此看来，把莫尔看作现代英语散文史的起点自有其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根源。

但是，必须看到，莫尔深受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的影响，骨子里崇尚拉丁文化，坚守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价值，而他的英语散文则更倾向于世俗调侃文化。正如后世一些英国文学史家所言，莫尔的英语写作语言本色而流畅，戏剧性的幽默轻松中透出论辩的锋芒，但也免不了拉丁句式的影响，英语的表达常常失于直截了当的准确和简练。因此，莫尔并不代表着英语散文的发展方向。(参见本书第 37~38 页有关莫尔散文的论述)须知，散文是社会语言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形成与发展与同时代的社会心理、经济形态、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语言史等因素息息相关，它的文体风格的演变也必定受到上述因素发展变化的影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在个人的才能和传统文化之间，社会文化传统总在起着主导的作用。正如一些散文史家指出的那样：“莫尔是一个大散文家，但是他只是他那个时代散文总体发展的一分子。那时英语散文写作再次趋近口语化，而这样的变化在英语散文史中已不止一次了。”<sup>2</sup>而且，对于思考现代英语散文的形成问题，选定一个代表性的天才作家作为其源头，是见树不见林的片面看法，容易忽略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总体文化对语言和写作的商讨和塑构作用。

---

2 Gordon, Ian A. *The Movement of English Prose*.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66.

其实，我们也许可以避免有关政治和社会的用途以及文学性优劣的主观判断，把注意力从具体的散文家身上暂时移开，把现代英语散文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历史参照系中，从英语语言史和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它的形成和发展，视野就自然开阔多了。

笔者认为，从英语散文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看，1476年绝对是一个具有本源性的、视野开阔的制高点。这一年，一个自学成才、崇尚实业的英国人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c. 1422-1491）在伦敦开办了英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书刊印刷坊。他印刷出的第一本英语书就是乔叟（Geoffrey Chaucer, c. 1343-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从此，在英国，语言文本开始脱离有限的手抄作业，进入机械复制的进程。这是具有现代信息传播学意义的大事件。按照权威巨著《剑桥英语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第三卷的观点，印刷术的产生也象征性地标示着“早期现代英语”的源头。<sup>3</sup>而且，此后短短的不到十年，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战役中战胜了约克王朝的理查三世，结束了封建势力争权夺利的“玫瑰战争”，建立了都铎王朝。这又是一个历史的新起点，英国社会开始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可见，从宏观而论，1476年在伦敦出现的印刷术，不论是从政治意识，还是从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来看，也不论是从英语语言史，还是从现代信息传播史和社会文化史来看，都是具有现代意义的进步，都为此后几个世纪现代英语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卡克斯顿在欧陆期间译自法文的《特洛伊史》（*The Recnyell of the Historyes of Troye*）成了英语史上第一本印刷装订的英语散文书。从此，现代英语散文开始借助印刷媒介走向大众，逐步形成了自身的诸多特征，也开辟了现代英语文学和文化教育的新天地。这是英语语言文化走向现代的重要转折，也是16世纪初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知识和艺术的传播之源。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我们不妨把15世纪末印刷术这一信息媒介工具性的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早期现代英语的形成和散文的写作和传播，视为现代英语散文的起点，顺着这一思路来考察现代英语散文此后几个世纪中的发展和变化。

而且，这也是一个现代英语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回顾来路，但见江上数峰：公元9世纪艾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849-899）时代古英语文化的复兴；1066年诺曼征服后，漫漫中世纪英语在拉丁语和法语的挤压下的坚守和重光；还有15世纪中古英语诗歌和散文的光彩。展望去路，坚冰已破，水天一色开阔：印刷术这一新的信息传播手段推动了英国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人文主义在英国的传播，见证了英语在与外来语言文化碰撞中发展成形并得以不断丰富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伊丽莎白时代文学的辉煌。难怪，身处这一文学繁荣高峰，崇尚人文科学的哲学家和散文大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就这样说道：“印刷术改变了整个世界一

3 Lass, Rog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Vol. 3.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切事物的命运和现状。”<sup>4</sup> 纵观人类文化史以及当今大众传媒网络化和数字化符号的全社会弥漫之势，培根此言，至今想来不嫌夸张。

我们研究和欣赏英语散文，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对英语国家社会的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文学传统的源流、体裁和类型，英语散文成就的高峰，国别散文文学之间的借鉴和影响，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及其得失，甚至是文学翻译史等，都必须有个清晰的谱系性的了解，必须站在社会文化的高度获得整体的观照，这样方能在随后的文本解读和鉴赏中做到心中有数。

接下来，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做一番梳理，看看英语的变迁是如何促成了现代英语散文的形成和发展。

\*\*\*

## 第二节 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黄金时代”

5 世纪初罗马军团撤离不列颠。随后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并逐步征服了英格兰，形成以贵族宗法和族群为基础的各个地方势力和集团。经过“七国时代”相对稳定而漫长的发展阶段，到了公元 7~8 世纪，盎格鲁-撒克逊各族实现大一统，语言文化也呈现出一个“黄金时代”。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在其《英国史》中这样描述这个时期英格兰的新开局：“自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第一次登上不列颠岛到现在已近四百年，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公国又统一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王权之下。纵然整个英格兰尚未高度凝聚于新王埃格伯特（Egbert）国王治下（这一点与人们以前所说的不同），但是，这位君王的权势和各地区的大一统局面开辟了未来持久的繁荣稳定，前途呈现一派光明。看来，此后的英格兰将成为各邻国的劲敌，而不再遭受各国反复的持续的入侵和无情的毁灭。”<sup>5</sup> 在如此的格局下，英格兰彰显出在其几百年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繁荣。

公元 597 年，圣徒奥古斯丁奉罗马教皇之命率众僧历尽艰辛，到达英格兰南部肯

4 Bacon, Francis. *The Novum Organum*. Ed. G. W. Kitch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55.

5 Hume, David. *A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John Murray, 1902.

特的坎特伯雷传教。此后，基督教文化迅速在不列颠岛传播开来。半个世纪以后，来自不同地域的神学家和学者来到不列颠。第七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德高望重的西奥多（Theodore of Tarsus, c. 602-690）来自西西里。与他同行的神学高人哈德里安（Hadrian of Canterbury, ?-710）则来自非洲。他们不仅成功地整肃了教会组织，解决了教派分歧，还着眼未来，共同联手在坎特伯雷创办教会学校，教授拉丁文、希腊文、神学、文章修辞、音乐诗歌、天文学和数学。来自西撒克逊的修士、神学家和诗人奥尔德赫姆（Aldhelm, c. 639-709）也在此时来到坎特伯雷学校拜师求学，吟写拉丁诗歌和谜语，同时学习罗马法、天文学和历法学。他们的学校在当时享有盛名，吸引了英伦南北的学子前来学习，甚至有的学生从爱尔兰跨海而来。英国第一部教会史的作者、诺森伯兰的大历史学家“至尊比德”（Venerable Bede, c. 672-735）这样描述道：“由于有了这样的学校，以前只限于肯特地区的神圣音乐知识，现在开始传遍英格兰所有的教堂。”<sup>6</sup>

在遥远的北方诺森伯兰海滨以外，则有坐落在圣岛上的著名的林迪斯法恩（Lindisfarne）修道院。英格兰最著名的先知圣人卡思伯特（Cuthbert, c. 634-687）曾在此做过主教。其间还有高僧伊德弗里斯（Eadfrith）皓首穷经，毕一生心力，精心修成了千年古书《林迪斯法恩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此书用装饰性很强的海岛式手写体拉丁文写成，汇集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书中绘有精美的地毯页、作者图像页和首字母页等装饰页，既是基督教文化的记录，又是基督教艺术的奇观。圣岛以南八十多公里，纽卡斯尔以西，蜿蜒曲折的唐河（River Don）注入泰恩河（River Tyne），河口处就是圣地贾罗（Jarrow），不远处的河畔坐落着著名的圣保罗修道院（St. Paul's Monastery, Jarrow）和邻近的芒克威尔茅斯圣彼得修道院（St. Peter's Monastery, Monkwearmouth, Jarrow）。大学问家比德在这里毕其一生释经论道，读书写作。他用拉丁文于731年写成了传世巨著《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以史料形式记载了5~6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社会状况和宗教文化。比德也因此被誉为“英国史学之父”。除此之外，比德还著有《修道院院长列传》（*Lives of the Abbots*）等近四十种著作，内容涉及宗教哲学、文法修辞、天文历法等领域。7~8世纪，贾罗地区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又一中心，其影响辐射到爱尔兰，乃至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

上述这些语言文化活动都出于虔诚的宗教精神，高在庙堂之上，而且大多用当时教会僧侣的通用语言，即拉丁语进行记录或著述。本土的古英语则是世俗社会的语言，显得更实用一些，主要见于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描述以及地方法律文书等。唯一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的古英语则带有传奇色彩。这就是发生在约克郡东海岸的威特比修道院

---

6 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Trans. Leo Sherley-Price. N.p.: Penguin Classics, 1991.



(Whitby Abbey) 中的神奇故事。据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记载，一个名叫卡德蒙 (Caedmon) 的文盲放牛娃从来不会用拉丁文唱宗教赞歌。一夜梦中他突然获得神谕，顿时开口用古英语唱出优美的赞歌，随后便娴熟地用古英语吟诗作对。他随即被引入修道院，面对着那些用拉丁文轮番唱诵赞美诗的修士，卡德蒙用古英语唱出了绝妙的赞美诗篇。修士们都是来自各地，死抠拉丁文法的学究，自然不愿看到英语土话登上大雅之堂，于是对卡德蒙的这些诗句嗤之以鼻。好在女修道院院长希尔达 (Hilda) 顶着压力把这些古英语诗句记录了下来，部分保存至今。它们的年代比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 早了大约三百年，象征性地标志着英国文学的遥远的开端。

从这一派歌舞升平中可见，当时的英格兰长期无战事，社会相对稳定，人们尚文不武，开始皈依基督教。教会领袖们为了源于爱尔兰或罗马的不同教派的历史统一问题而争论不休，却不知北方的“异教徒”已经蠢蠢欲动，开始侵扰他们的安宁了。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的结尾处就曾经这样写道：“当今国泰民安，人们大多闲置兵器，热衷于皈依而不读兵书。长此以往，未来如何，我等尽可拭目以待。”<sup>7</sup> 比德忧心忡忡的言语之间，大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燕雀不知大厦之将倾”的感叹。

比德之后，固然出现过像阿尔昆 (Alcuin, c. 732-804) 这样的拉丁文化大家，倡导发明了著名的“加洛林小字书法体” (Carolingian minuscule)，为《圣经》撰写注评，并整理保存了大批盎格鲁-撒克逊的拉丁文化典籍。但是，这毕竟是强弩之末，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繁荣在逐渐聚集的北欧入侵威胁的阴云中已经走进了它的黄昏。

比德的担心很快成为现实。不久，手持利斧，乘坐大船的维京人 (Vikings) 蜂拥南下。公元 793 年，这些凶悍的北欧海盗攻入林迪斯法恩修道院。他们把修道院洗劫一空，还挖空圣坛，劫走埋藏在地下的财宝。僧侣们被杀的杀，掳的掳，有些还被剥光了衣服赶到海里淹死。阿尔昆此后不久痛心地记载道：这是“不列颠被异教徒蹂躏以来前所未有的恐怖行径……这些异教徒把基督教圣徒的血洒在圣坛周围，在上帝的殿堂里把圣徒的身体踩在脚下”。<sup>8</sup> 公元 875 年，幸存的教士们迫于北欧海盗的不断威胁，决定南下另寻圣地。他们抬着圣人卡思伯特的棺木辗转漂泊，最后将其安葬于威尔河 (River Wear) 河畔的马蹄形高地上。此后，著名的达勒姆大教堂 (Durham Cathedral) 在这里拔地而起，成为了英格兰北方的圣地。大学问家比德也安葬于此。在这场浩劫中，《林迪斯法恩福音书》幸免于难，得以保存在今天的大英图书馆。公元 793 年林迪斯法恩修道院遭劫这一事件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的衰落和维京人时代的开端。一年之后，维京人又沿海岸南下，洗劫了圣地贾罗的修道院。9 世纪初，一波又波的维京

7 Bed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Trans. Leo Sherley-Price. N.p.: Penguin Classics, 1991.

8 <http://scih.org/the-viking-raid-on-the-abbey-of-lindisfarne/>

人连年大规模入侵，并在北方重镇约克站稳了脚跟，建立了自己的都城。此后，挪威人和丹麦人大举向南进攻，盎格鲁-撒克逊圣地威特比修道院随即又遭劫难。不久维京人征服东安格利亚，逼近英伦腹地，所到之处，英格兰土地上生灵涂炭，教堂和修道院被洗劫一空，盎格鲁-撒克逊的拉丁文化典籍荡然无存。

---

## 本节例文

### Caedmon's Poetical Inspiration

VENERABLE BEDE  
(c. 672-735)

In this abbess's monastery was a certain brother made especially famous and honoured with a divine gift, because he was accustomed to producing suitable poetry which pertained to religion and piety, such that, whatever he learned from divine scriptures through scholars, he was able to transpose into poetry afte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dorned with the most sweetness and inspiration, and to produce it well, and mad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He was established in the secular life until a time when he was advanced in years, and he had never learned any poetry. And he was often in drinking parties, when there was decreed, as a cause for joy, that they should all sing in turns to the accompaniment of the harp. When he saw the harp approach him, he rose up for shame from that feast and went home to his house. On a certain occasion when he did just that, he left the building of the drinking party, and went out to the animal shed, the care of which had been given to him that night. Then, in due time, he got himself settled in rest and slept, and a man stood before him as if in a dream and called him and greeted him and spoke to him by his name: "Caedmon, sing me something." Then he answered and said: "I cannot sing; and therefore I left the party and came here, because I am not able to sing anything." Again, the one who was speaking with him said: "Nevertheless, you must sing something for me." Then Caedmon said: "What shall I sing?" He said: "Sing to me about Creation." When he got this answer, he began to sing straightaway in praise of God the Creator, in verse and words that he had never heard, of which the arrangement is:

Now praise the Guardian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the might of the Creator and his conception,  
...



Then he arose from sleeping, and all that he had sung while sleeping was secure in his memory, and immediately he added many words in the same metre to the words of the worthy poem to God. In the morning, he came to the estate's reeve who was his superior; he told him about the gift that he had received. And straightaway the reeve led him to the abbess and he informed and told her. Then she instructed that all the most learned men and students should be gathered together, and she asked Caedmon to tell them his dream and sing the poem, so that all of them who were selected might judge what the poem was and where it came from.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731*

## 卡德蒙的诗歌灵感

至尊比德 (c. 672-735)

此修道院由女修道院院长主持，其间住一粗人，因得神灵启迪，名气颇大，且受人敬仰。此人惯于赋诗，吟唱教会之事、虔诚之议，凡受教于文人，习得圣经书，须臾之间便可赋念成诗。其诗绝美而有灵气，竟成英语之佳句……

此人曾为一俗人，浑浑噩噩不觉成年，亦未曾学习诗书。闲来与人饮酒厮混，或有约，席间众人皆应轮番应和竖琴而歌，以此作乐。此人怯之，每见竖琴趋近，便面带愧色，起而离场，径自回舍歇息。有时，他离开酒肆闹场，来到厩栏，一夜照看牲畜。一次，时辰已晚，此人困乏欲睡，恍惚梦中但觉眼前站立一人，直呼其名曰：“卡德蒙，吟唱几句我听之。”卡德蒙闻声答道：“我不会唱，故而避酒肆而到此，皆因我不会唱诗。”来人又道：“如此，你仍须唱几句我来听。”卡德蒙无奈道：“唱何事？”其人道：“唱创世之事。”卡德蒙闻此言，开口便唱，赞美上帝创世之功德，其词语其诗句，他自己从未听闻。此诗如曰：

赞美天国之灵主，  
创世而孕育之功，  
……

唱毕，卡德蒙梦醒而起，梦中所唱记忆如新，毫无遗漏，遂在此赞美上帝之颂诗中增添众多词句，其音律同一整齐。晨至，卡德蒙入见镇长，告知神赋诗艺。镇长闻之，携卡德蒙直趋来见女修道院院长，俱告其事。院长随即尽召饱学之士聚集一堂，着卡德蒙讲述其梦幻之事，并当堂吟唱其诗。如此，众学人贤达皆可判明此诗之真伪及源流。

译自《英吉利教会史》(731)

### 第三节 艾尔弗雷德大帝的古英语文化复兴

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从北方入侵的丹麦人已经控制了英格兰北方大部分土地。871年，丹麦人再度大举南侵，大有完全征服不列颠之势，盎格鲁-撒克逊人面临灭种之危险。然而，乱世自有英雄出。位于英格兰西南部的西撒克逊王国出了个艾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 849-899）。他修文治武，励精图治，力挽狂澜，成功抵御了丹麦入侵者的进攻，并与之划界议和，为撒克逊人赢得了和平。同时，他也拯救了古英语文化，并通过翻译拉丁典籍为古英语文化带来了复兴的机遇。

艾尔弗雷德从小敏学好诗，向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但他生逢连年战乱，没有能够系统地接受古典文化教育。对此他缺憾终生。但艾尔弗雷德是天生的领袖，具有文化方面的战略眼光，也不乏军事和政治才干，故能在乱世中保民而王。他也更懂得，面临如潮的北欧人入侵，西撒克逊王国纵可殊死抵抗，或可获得一时偏安，但人民若没有精神文化追求，则民生终不可治，江山终不可保。因此，艾尔弗雷德决意复兴盎格鲁-撒克逊的英语文化，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广纳人才。他从北边毗邻的麦西亚王国、西边的威尔士，甚至欧洲大陆请来最著名的神学家和学者，在宫廷中坐而论道，讲授拉丁文化。他开办宫廷学校，提倡在基础教育中用英语教学。当时用英语写成的教科书十分稀少。为了让更多不懂拉丁文的大众用英语学习“智慧之书”，艾尔弗雷德以身作则，带领一批学者把当时最经典的拉丁文著作翻译成古英语散文。这些著作包括，教皇格列高利（St. Gregory I）的《对话集》（*Dialogues*）和《精神向导》（*Pastoral Care*）、哲学家波伊提乌（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历史学家奥罗修斯（Paulus Orosius）的《反异教的历史》（*Seven Books of Histories Against the Pagans*）、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自语集》（*Soliloquies*）和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等。今天看来，这些古英语翻译著作稳定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文化，也都是现代英语散文的远古基石。

翻译成了这一时期的古英语散文的主要形式。对于艾尔弗雷德，翻译文化典籍是执政和军务之外的头等大事。当时拉丁散文句法严密，用词典雅，语义抽象，而古英语散文教诲性强，句式较为松散，表达力有限。译者要忠于原文，又要使普通读者乐于阅读，绝非易事。艾尔弗雷德在翻译中善于采用“归化”手段，不拘泥于语言形式的对等，化解原文句式和修辞的拘谨，取其义而述其要，用日常的古英语，加以生活具象和强势

动词，有效地表达了原义。例如，拉丁原文直译应为：“如果不能简明地描述如何逐一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那么列举出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呢？”为了使普通读者懂得这个道理，艾尔弗雷德把这个句子译为：“如果不能简单地说出这些钥匙都可以打开哪些锁，那么叫出这些钥匙的名称又有什么用呢？”又例如，拉丁文《圣经》里说（直译）：“智者之言如深水。”对此艾尔弗雷德更为形象化的译文是：“有智慧的人在心中筑起堤坝，形成一池深水。”<sup>9</sup>有时，译者个人的理解和感悟，也会溢于言表。艾尔弗雷德曾在为译书撰写的“序言”中说：“我之翻译，有时逐字逐句，有时逐一意译。”他的译文不是拉丁化的古英语，而是“根据拉丁文创造出的一种几乎全新的语言媒介”。<sup>10</sup>因此，有散文史家这样评价：“艾尔弗雷德大帝堪称英语散文之父，这绝非夸大之辞。”<sup>11</sup>如果考虑到当时各地教士用古英语编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也受到了艾尔弗雷德的鼓励及其散文文体的影响，如果也要找寻这么一位标志性的先驱文化人物，那么在英语散文史上艾尔弗雷德大帝则无愧于“英语散文之父”的称号。

---

## 本节例文

### Why I Translate Latin Books into English

ALFRED THE GREAT  
(849-899)

Therefore it seems better to me, if it seems so to you, that we also should translate certain books which are most necessary for all men to know into the language that we can all understand, and also arrange it, as with God's help we very easily can if we have peace, so that all the young freeborn men now among the English people, who have the means to be able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it, may be set to study for as long as they are of no other use, until the time they are able to read English writing well. Afterwards one may teach further in the Latin language those whom one wishes to teach further and wishes to promote to holy orders.

Then when I remembered how the knowledge of Latin had previously decayed throughout the English, and yet many could read English writing, I began among

---

9 Duckett, Eleanor Shipley. *Alfred the Grea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10 Gordon, Ian A. *The Movement of English Prose*.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66.

11 Gordon, Ian A. *The Movement of English Prose*.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66.

other various and manifold cares of this kingdom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the book which is called *Pastoralis* in Latin and *Shepherd's Book* in English, sometimes word for word, sometimes in a paraphrase, as I learned it from my archbishop Plegmund, and my bishop Asser, and my mass-priest Grimbold and my mass-priest John. When I had learned it, I translated it into English as I understood it and as I could interpret it most intelligibly...

“Preface to the translation of Gregory’s *Pastoral Care*”, 890

## 我为何用英语翻译拉丁文著作

艾尔弗雷德大帝 (849–899)

因此，以我观之，有些典籍，社会大众皆须知晓，理应翻译为大众皆可识读的语言并整理归类。此议，想必各位亦有同感。当今上帝垂顾，若边关战事止息，此事可望行来不难。如是，英格兰境内，自由出生之年轻人，凡有财力于学问之人，闲暇之时便可致力于学习，久之便可畅读英语之书。往后，对于有望进一步深造之人，可教授其拉丁文，以期晋升教会之职。

以我所见，英格兰一国上下，拉丁文学问已经衰落，而不少人却能读习英语之书。所见如此，我虽为一国纷杂政治军务所累，亦始用英语翻译这本拉丁文著作，其拉丁文书名为 *Pastoralis*，英语书名译为《牧人之书》。我之翻译，有时逐字逐句，有时逐一意译。这亦是我从大主教普莱格默德、主教大人阿瑟，还有我的弥撒教士格雷姆伯德以及约翰教士学到的技艺。我读到这本书，按照我的理解以及解释得最合理的意思将之译为英语。

译自《格列高利〈精神向导〉古英语译本序言》(890)

\*\*\*

## 第四节 古英语布道文：阿尔弗里克和伍尔夫斯坦

艾尔弗雷德大帝于 899 年逝世后，教会加强了对社会大众的教化活动，古英语散文进一步走向民间，形成一种以布道文为主的古英语散文文化。这一期间出现了两位代表性的人物：阿尔弗里克 (Aelfric, c. 955-c. 1010) 和伍尔夫斯坦 (Wulfstan, ?-1023)。他们都是受过良好古典语文教育的主教或修道院院长。重要的是，他们都用古英语写

作，并都力图通过提高古英语的表意和修辞水平，以求把基督教教义和福音传达给更广大的下层受众。他们的古英语散文更多的是劝导文和布道词。

阿尔弗里克著述甚丰，写了《天主布道文集》(*Catholic Homilies*)、《圣徒传》(*Lives of the Saints*)，并写出旨在帮助人们学习拉丁文的《词汇集》(*Glossary*)、《文法》(*Grammar*)以及《拉丁文会话手册》(*Colloquy*)。阿尔弗里克继承了艾尔弗雷德大帝散文的简化传统，他的布道散文力求简明实用，多用口语表达，用英语复合词代替拉丁文专有词，句法也出现简洁的趋势。他明确提出：“我从不采用晦涩之词，而是使用简明的英语词汇。”<sup>12</sup> 阿尔弗里克应是英语散文史上最早提倡大众口语化简明散文的人。在《圣徒传》中，阿尔弗里克的古英语散文笔法十分生动，在历史叙事中刻画的人物形象也是栩栩如生。例如，在记叙东安格利亚国王、殉道者埃德蒙的事迹时，阿尔弗里克绝不满足于对埃德蒙虔诚品格的评价，而是突出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对比产生小说般的叙事效果。其中，作者让圣徒埃德蒙在面对招降的最后通牒时发出了为了信仰的延续和臣民的安危“生死相随”(swelte ic, lybbe ic)的誓言，可谓是中世纪圣徒中少有的强音。在阿尔弗里克的笔下，北欧海盗首领的专横和残暴，埃德蒙的不屈和坚定信仰，都在人物的言语中跃然纸上。(参见本节例文第14~15页)此外，阿尔弗里克的《文法》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本用古英语写成的拉丁文法书，对后世学人影响甚大。另外，他的《拉丁文会话手册》反映了当时各行业工匠的生活状况，对历史学家的研究具有相当宝贵的参考价值。

另一位古英语的传播者伍尔夫斯坦也写了大量的布道文、法律和宗教文件以及哲学思录。当时丹麦人大举南侵劫掠。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伍尔夫斯坦身为伦敦主教、约克大主教，起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宗教领袖的作用。他的布道和写作对稳定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安定颇有影响。他那本《政治体制》(*Institutes of Polity*)是反映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晚期政治理论的重要著作，对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了分析，对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力的关系也有清晰的界定，还提到王权代表上帝为人民的福祉而行使权力，这也许是较早提出的“君权神授”的一个范例。伍尔夫斯坦写了多篇古英语布道文和若干篇拉丁文布道文。他的古英语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其基本特征就是简明实用，表述当下社会中最突出的问题，并在反复回旋的修辞中重复关键意念，意图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和警觉。比如，他叙述盎格鲁-撒克逊人如何被入侵的野蛮人欺凌，说明这是人们长期藐视上帝和不思进取的结果，在短短的段落中连续反复使用 Godes yrre (God's anger)，力图达到警醒世人的效果。(参见本节例文第16页)伍尔夫斯坦的古英语散文特别注重形式，他在行文中常突出古英语中间断句的特点，并列一连串包含两

12 Stanton, Robert. *The Culture of Translation in Anglo-Saxon England*. New York: D. S. Brewer, 2002.

个重音的短语，在头韵和其他音韵修饰的配合下，使古英语更加具有节奏感和表现力，从而也增强了布道文的说服力。这些突出的特点也是后世学者对古英语进行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此外，伍尔夫斯坦继承了阿尔弗里克布道文中口语化的古英语散文文体，避免使用诗歌词汇和意象，创造出一种既为大众所接受，又显得平易中趋于“高雅”的古英语散文体式。

尽管古英语散文在翻译拉丁文化典籍和布道教诲文的使用过程中不免受到拉丁文化的影响，比如大量使用条件从句和同位语并列，但是总的来说，古英语在词法、句法和修辞格诸方面都逐渐成熟，古英语散文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事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展现出英语散文的发展前景。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一波多折，充满了戏剧性。大不列颠岛的盎格鲁 - 撒克逊语言和文化复兴才见起色，新一轮的外来入侵和征服又无情地击破了古英语文化和散文持续发展 and 繁荣的梦想。

---

## 本节例文

### The Passion and Faith of King Edmund

AELFRIC  
(c. 955-c. 1010)

It happened eventually that the Danish people went with a fleet ravaging and attacking far and wide just as their custom is. In that fleet were the foremost leaders Hinguar and Hubba, united through the devil, and they landed their ships in Northumbria and wasted that land and murdered the people. Then Hinguar went east with his ships and Hubba remained in Northumberland, having gained victory with cruelty...

Then immediately afterwards, he sent a boastful message to the king that he should bow down in tribute if he valued his life. The messenger came to King Edmund then and quickly delivered Hinguar's message to him: "Hinguar, our king, keen and victorious on sea and on land, has power over many people and now comes quickly here with an army to land so that he might have winter quarters here with his troop. Now he commands you to share your secret treasure and the wealth of your ancestors with him immediately, and you are to be his under-king if you wish to stay alive, for you do not have enough power to be able to withstand him."

Indeed, then King Edmund summoned the bishop who was nearest to him,



and considered with him how he should answer the cruel Hinguar. The bishop was fearful of this sudden event and for the king's life, and said that it seemed advisable to him that he should submit to what Hinguar demanded from him. Then the king fell silent and looked to the ground and said regally to him next: "Sadly, bishop, the wretched people of this land are treated too miserably, and I would rather fall in battle now as long as my people might enjoy their homeland." And the bishop said, "Alas, dear king, your people lie dead, and you do not have help to enable you to fight, and the Vikings will come and will bind you alive, unless you save your life by flight, or you save yourself by submitting to them." Then King Edmund said, very brave as he was: "I desire and wish in my mind that I do not remain alone after my beloved thanes who, with their children and women, have been quickly killed in their beds by these Vikings. It has never been my custom to take flight; I would rather die if I must for my own homeland; and almighty God knows that I will never deviate from his service, or from his true love, whether I die, or I live."

*Lives of the Saints*, 996-997

## 埃德蒙国王的激情和信仰

阿尔弗里克 (c. 955-c. 1010)

事态终发展如此，这些丹麦人的船队惯于涉远征讨，所到之处攻城略地，烧杀抢掠。船队大首领辛古阿和胡巴，一对魔鬼兄弟，联手作恶。他们的船队到达诺森伯里亚，杀人放火，把村镇夷为平地。一路残暴掠夺，所向披靡之后，辛古阿率船队往东去，胡巴则留在了诺森伯兰……

辛古阿紧接着给埃德蒙国王送去一封趾高气扬的信：如果还想活命，就必须俯首称臣。信使到达埃德蒙王宫，立即宣读来信：“我们的大王辛古阿，海上陆地所向披靡，征服部落无数，现即刻率军登陆此地屯军过冬。大王命令你等，立刻献上你宫中珍玩、祖业财宝。你要想活，就做大王的藩王，因为以你的力量，不足以阻挡大王的进攻。”

事不宜迟，埃德蒙国王当即召心腹主教大人进宫，商讨如何应对这残暴的辛古阿。事急之中，主教惊慌失措，亦担忧国王性命，于是建议国王俯首称臣，任凭辛古阿摆布，如此不失为理智之举。埃德蒙国王听罢默不作声，低头看地，然后正颜说道：“主教大人，这片土地上不幸的人民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惨不忍睹。若能让朕之臣民享有幸福家园，朕宁愿即赴战场战死！”主教说道：“我亲爱的王上啊，您的臣民已经横尸野地，没人来帮您赴死战场了！这些维京人到来，会把您活活绑去。逃走也可以保全一命，否则只好投降以保命了！”埃德蒙国王一如既往，勇敢而坚定地说道：“朕心已定，众爱卿及他们床上的孩子和女人既然已经相继死于这些维京人的刀下，朕亦不愿独自苟活于世。朕从不习惯逃跑；只要是为了朕自己的家园，朕宁愿去死。万能的上帝在上，朕绝不动摇侍奉上帝的决心，也不愿离开上帝爱的怀抱，生死相随！”

译自《圣徒传》(996-997)

## Divine Anger on the English

WULFSTAN

(?-1023)

And many misfortunes occur to this nation often and frequently. For long now,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nothing has prospered, but there has been devastation and persecution in every place often and frequently, and the English have now for a long time been completely victory-less and greatly disheartened because of God's anger. And the sailors are so strong because of God's permission that often in the battle one will rout ten, sometimes less, sometimes more, and all because of our sins. And often ten or twelve, each one after the other, shamefully insult the wife of a nobleman, and sometimes his daughter or close kinswoman, there where he, who considered himself important and powerful and brave enough before that happened, looks on. And often the slave binds fast the nobleman who was his lord previously, and makes him a slave because of God's anger. Alas for the misery and alas for the great disgrace that now happens to the English, all because of God's anger!

*Sermo Lupi ad Anglos*, 1010-1016

## 天谴英格兰人

伍尔夫斯坦 (?-1023)

这个国度灾祸连连，持续常态，经年持续着内忧外患。各地不是满目疮痍，就是生灵涂炭，概无好事可言。时至今日，英格兰人无一胜绩，士气低落。这都是因为上帝之怒。上帝许诺了维京海盗战力强盛，战场上一个丹麦人往往击溃十\*个英格兰人，这个数字有时少，有时则更多。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犯下的罪过。常有此情景：十多个维京人不知廉耻，轮番强暴一个英格兰贵族的妻子、女儿或家族近亲的女人，而这位往常高视阔步，自认为强大无比、勇武过人的英格兰贵族，却在一旁观看！常常，奴才用绳索紧紧捆住以前的贵族主人，驱之为奴。这都因为上帝之怒。啊，悲苦啊！啊，当今的耻辱啊！一切都源于上帝之怒！

译自《英格兰之狼布道》(1010-1016)

---

\* 考虑到本书选文部分的文学性，故译文部分的数字采用汉字形式。

## 第五节 诺曼征服以来中古英语的状况和复兴

紧接而来的是中古英语的发展时期。英语语言史家把这个时期大致定于1100年始，至1500年终。<sup>13</sup>从宏观一些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起点和终点也正好与英国历史上两个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社会政治事件的时间大致相吻合，即1066年的诺曼征服和1485年都铎王朝的建立。

1066年1月5日，英格兰国王忏悔者爱德华驾崩无嗣，由王后之兄哈罗德即位。9月，有点英格兰王族血统的诺曼底威廉公爵决心争夺英格兰王位，随即率领说法语的近万名诺曼底铁甲骑士和弓箭手，跨过英吉利海峡，进抵英格兰南部小镇黑斯廷斯，在不远的开阔的绿色原野上摆开决战架势。对面的英王哈罗德二世刚在北方击败来自挪威的入侵之敌，率领王师日夜兼程，从几百公里外的约克奔驰到南部的战场。此时的疲惫之师决计一搏，士气高涨。

英国历史上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由此打响。经过一天的拉锯式厮杀，威廉巧用“拖刀计”，终于胜出，把撒克逊武士砍杀殆尽，哈罗德国王也中箭身亡。威廉乘胜率军进入伦敦，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国新国王。随后，踌躇满志的威廉在泰晤士河河畔筑起了雄视全城的伦敦塔，沿着罗马时期修筑的伦敦城墙向外拓展，开始了诺曼底王朝的统治。

在远处高坡上观看这场厮杀的英格兰农夫和牧人，根本意识不到这也是社会语言变局的开端。他们将沦为说法语的诺曼底贵族统治下的低等臣民，而他们的英语将沦为乡巴佬土话。对此，后世苏格兰大作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有过清晰的描述。（参见本书第226~227页）

中古英语时期，英国社会三种语言并存：宫廷里的诺曼贵族和大领主们操一口诺曼法语以显示高贵的身份；教会僧侣和知识教育人士则以拉丁语为布道或著述的正宗；只有中下层的雇农和城镇劳动者才用英语进行日常生活交流，在劳动中维持着艰辛而又枯燥的生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用法语和拉丁语表述，主导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英语只能在社会底层的日常口语间流动。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英语散文写作只能处于蛰伏状态。

这是一个诺曼法语诗歌文学和罗曼故事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法语和拉丁语挟上层

<sup>13</sup> 李赋宁. 英语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贵族和教会的统治权力，占有绝对的政治和社会文化话语权。法语是宫廷和官场的通用语言，而土生土长的英国本土学者和诗人大多用拉丁语写作，例如，史学家、“亚瑟王”传奇的首倡者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 ?-1155），史学家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 ?-1259）和神学哲学家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 c. 1185-1245），还有被后世誉为“实证科学之父”的哲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 c. 1220-1292），等等。他们都用拉丁语撰写著作，而带有泥土气息的英语上不得台面，更不要说著书立说。

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少量的用中西部中古英语写成的教诲文，但是更多的则是下层人民口口相传的英语民间故事，还有就是教会用于吸引下层信众而用英语书写的布道、祷告和教化手册。法语和拉丁语在政府和法律部门占有绝对优势。

但是，在这三重的社会语言结构中，最底层的英语却有颠覆主导话语的潜在因素：几个世纪以来，英语一直渗透在法语和拉丁语的使用中，比如英文地名约定俗成，不可更改；英语不断借用法语词汇而扩大其表现力；还有不断增加的拉丁化英语词汇等。相反，掌握拉丁语的教会高高在上，教士们以说拉丁语而获得文化优越感。而法国贵族讲究国王威仪、骑士精神和宫廷情爱，展示出掌权者的自恋和傲慢。他们鄙视下层劳动者的低俗文化，也对下层社会的教化没有太大的兴趣，因此其语言和文化也就未能渗透到说英语的下层民间。于是，英语一直可以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中得以使用和成长。英语散文写作意识也在英格兰教士和文人，甚至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意识中潜伏，蓄势待发。一旦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转变，英语民族的文化自觉加深，英语国家意识增强，英语就必然会努力彰显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乃至后来居上，成为政治、法律、社会生活以及文化艺术表达的主要语言形式。

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社会的政治和法律、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也一直朝着有利于英语的方向发展。适合英语散文复兴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也必然到来。

政治和法律方面，1204年，英国贵族在诺曼底的封地完全陷入法国之手，在英国的诺曼底各大家族在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基础丧失，昔日的诺曼底贵族及其后代也开始逐渐认同脚下的这片英格兰大地，开始意识到“土生土长的英国人”（true-born Englishman）身份的重要。这是英国贵族乃至整个社会开始认同英语文化的开端。此后，1337~1453年间，英国与法国的百年战争和间断的“黑死病”瘟疫的爆发，更加强了人们的国家和社会归属意识。1258年，被后世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宪法的《牛津条约》（Provisions of Oxford）使用拉丁语、法语和中古英语颁布，成为诺曼征服两百年以来第一次用英语颁布的政治法律文件。此后，1362年颁布了《英语诉讼法案》（Pleading in English Act 1362），规定法庭语言一律采用英语。同时，英国国王也受不了海外君主的指手画脚，意识到本土语言和国家意识之于国际地位的重要，于是鼓励政府部门和

议会开始使用英语。“1386年，人们第一次用英语来写致议会的请愿书。在伦敦保存下来最早的一份用英语写的遗嘱属于1387年。最早用英语写的行会章程属于1389年。1399年的一封信用英语写的私人通信表明在社交生活中英语也代替了法语。”<sup>14</sup>到了1432年，威斯敏斯特的皇家大法庭开始用英语在全国范围内发布文告。最终，1498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正式废止法语，采用英语作为国家的官方语言。

经济生活方面，英语在长期的民间社会交往中积蓄了力量，其间也受到了外来语言的影响，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到了15世纪初，英语终于开始从几个世纪的压抑中冒头，展现了自己的存在和社会效力。公文和法律文件中使用英语已经见怪不怪了。英语写成的商业契约和书信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增多。同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贸易促进了中世纪小城镇的建立和伦敦商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中古英语在各种语言交流的碰撞中得以不断丰富，书写方式也始见规约。伦敦城市崛起，商业兴盛，服务行业和赞助活动频繁。伦敦的手工匠行会的信件和记载都用英语写成，伦敦商人也普遍用英语教育后代。大趋势下，伦敦酒商行业协会于1422年首先宣布放弃拉丁语和法语，转用英语书写商业契约，用英语记账。英语在以伦敦为中心的经济生活中广为使用，也大大促进了“英语官方文书标准”（Chancery Standard of Written English）的形成和推广。

文化教育方面，早在1350年，语法教育家康沃尔的约翰（John of Cornwall）就在牛津大学首先发起教学改革，率先用英语教授拉丁文法。接下来的就是中古英语的大翻译家约翰·特雷维萨（John Trevisa）。他用质朴的英语翻译了不少用拉丁文写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有雷纳夫·希格登（Ranulf Higden, c. 1280-1364）的《大编年史》（*Polychronicon*）和中世纪法国经院派大学者巴托洛梅乌斯（Bartholomaeus）的《物性论》（*On the Properties of Things*）。《物性论》是包括19个分册的鸿篇巨制，内容从上帝到人类，从飞禽到走兽，无所不包，堪称中世纪的“百科全书”。在这样大规模的翻译过程中，英语也吸收了大量的拉丁语和法语的词汇。这对后世英语散文的写作影响甚大。同一时期，牛津大学学者、神学家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 c. 1330-1384）和他的“罗拉德派”（the Lollards）反对教会专制和偶像崇拜，提倡天命既定，寄希望于大众的文化觉醒，于是用英语翻译了《圣经》，并身体力行，用英语布道，鼓励大众用英语谈论时事和宗教问题。此举把昔日君王和教会的高谈阔论随意地抛给平头百姓，不亚于一场社会语言的革命，因而被王权和教会视为洪水猛兽。威克利夫也因此受到持续的镇压。就英语的发展来说，这一带有宗教平等和民主的局面却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大众语言革新，使民间的英语识字率不断提高，对英语散文的再次兴盛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4 李赋宁. 英国中世纪古英语时期文学[J]. 外国文学, 1998(5): 57-61.



这就是英语复苏的过程。经过几个世纪的韬光养晦，英语吸纳内化了大量的外来词汇，简化了拼写和屈折变化形式，同时也坚持了艾尔弗雷德以来古英语较为简化松散的句法结构，终于趁英格兰国家意识和民族语言逐渐合流之机，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英语散文的再次繁荣创造了根本的条件。在中世纪，这也是一个英格兰本土意识增强，文化上逐渐脱欧的过程。

英语在社会生活中复出，自然地扩大了读者对英语译书和散文写作的需求，其内容不仅包括自然研究、政治哲学、宗教礼仪、通史和国别史，而且还涉及医学、体育、手相术、教育方法和圣徒传记等，也逐渐有了逸闻趣事和浪漫传奇。按照伦敦大学著名学者威廉·马修斯（William Matthews）的研究统计，到15世纪末，英国的读者大约可以读到三百多种英语书籍，内容涵盖中世纪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到了1500年，英语散文已经步入正轨，成为一种大众期待的文字形式，用事实、虚构故事和观点满足英国大众的理智和情感的需求。而这也正是当今的英语散文的社会功能。”<sup>15</sup>

\*\*\*

## 第六节 中古英语散文的特点

英语在中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中重光，其散文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多地还带有翻译和实用的性质。14世纪末逐渐冒头的大众化英语，还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丰富的诗人对之加以诗化和升华，方能孕育出具有文学意味的早期现代英语散文。而这正是伟大的“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 c. 1343-1400）和他同时代的几位伟大诗人的贡献。其中，威廉·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 c. 1330-c. 1400）的梦幻类比体（allegory）长诗《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约翰·高尔（John Gower, 1330-1408）的对话叙事体长诗《一个情人的忏悔》（*Confessio Amantis*），还有作者未详的骑士浪漫传奇《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都是中古英语的韵体杰作。乔叟则更进一步。他的大多数诗歌作品的内容都有很重的法兰西文化和意大利文化的成分，但他用的英语则是标准的伦敦方言，即综合吸收了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的东中部方言，是更接近后来的英语民族标准共同语的语言，也是后来普遍采用

---

15 Matthews, William, ed. *Later Medieval English Pros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3.



的文学语言。这一特点在他的诗体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和生动:一群三教九流的朝圣者结伴于一场宗教朝圣之旅,在旅途中为解闷讲述笑话故事;而在乔叟风趣幽默的笔端展现出来的,却是英国中世纪末世俗生活的全景图。

这一时期的中古英语散文开始追求自己的行文个性和修辞风格,出现了一批个性突出,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散文作家。

其中,较早的作家有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e, c. 1300-1349)。此人是中世纪英国少有的“怪才”,也是正统经院教会的叛逆者。他早年从牛津大学退学,与世无争,长年隐居或云游乡下,写了许多著述,包括散文。罗尔推崇独居幽处、静思坐忘,颇有中国竹林贤人风范。他游说于约克郡乡下,逢人便讲述自己在冥想中与上帝交流时飘飘欲仙,尽享天籁音乐的神秘感受,这对于此后清教主义的“内省皈依”多有影响。罗尔用拉丁文和有点带约克郡方言的中古英语写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用英语写成的《生活之路》(*The Form of Perfect Living*),大多讲述他内省静思的感受和“冥冥中与上帝相逢”的经历。为了让他的大批追随者读懂他的思想和经历,他的英语散文写得个性突出,“生动活泼,富于变化,有说服力”,<sup>16</sup>对当时的读者和教会受众影响极大。R. W. 钱伯斯甚至说:“在14世纪下半叶,或整个14世纪,他(罗尔)也许是英格兰所有作家中拥有最多读者的拉丁文和英文作家。”<sup>17</sup>

同时期的另一位奇人马杰蕾·肯普(Margery Kempe, c. 1373-c. 1440)是一位离家出走、追求永生的女隐士。她口述的《马杰蕾·肯普的书》(*The Book of Margery Kempe*)被认为是第一部用英语写成的自传。该书以奇异的思绪,梦幻般地讲述了她一生的诸多经历,其中描写了她多次与基督、圣母和上帝对话的情景,写得声情并茂,疯话连篇。这些离奇的自传经历在英语散文史上一直被看作神秘主义的异端邪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加以重视和研究。

中世纪英语散文作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沃尔特·希尔顿(Walter Hilton, c. 1340-1396)。据说希尔顿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得法律学士学位。此人是一个我行我素的神秘隐士,不过他没有像罗尔和肯普那样走火入魔,而是回到教堂当了个教士,甚至还卷入了当时激烈的反“罗拉德派”的宗教斗争。希尔顿用中古英语写了《论行思皆备的人生》(*On the Mixed Life*)等大量的宗教散文著作、评论和书信。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两卷本的《完美的尺度》(*The Scale of Perfection*)。书中细致地讲述了内省修行、弃恶扬善、最终获得救赎的必要和方法,一时成为14世纪英格兰最受欢迎的书,甚至被译

16 参见《大英百科》中关于Richard Rolle的条目

17 Chambers, R. W. *On the Continuity of English Prose from Alfred to More and His Schoo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为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大陆。希尔顿的散文语言十分平易而地道，后世的中世纪研究者这样评论道：希尔顿的“地方方言用起来轻松自如”，“如此平和冷静的散文风格并未形成名言警句，但是有时短语突转，用词恰当，比喻轻巧，读来兴趣盎然”。<sup>18</sup>

同期的约翰·卡普格雷夫（John Capgrave, 1393-1464）也是一位重要的英语散文作家。这是一位在剑桥大学课堂里激烈的宗教辩论中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他虽站在教会正统的立场，但坚持宗教的正统必须建立在理性和知识的基础上，因此他对威克利夫的“罗拉德派”的“异端”持较为辩证的态度。这种宗教的智性主义对他的写作多有影响。他的散文作品中最有影响的著作是《编年史略》（*Abbreviation of Chronicles*），对奥古斯丁基督教范围内的世界的历史做了大致的描述。此外，他也写了不少圣徒传记，还为国王亨利六世立传。他的散文是地方化和口语化的文体，英语语言十分地道简练，有时还显出滔滔的辩才。

在英语叙事散文方面，托马斯·马罗礼（Thomas Malory, c. 1415-1471）在狱中写成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堪称一绝。马罗礼其人生平不详，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大多是猜度之录，无非说明此人一生混迹江湖，多次入狱，一事无成。《亚瑟王之死》作者身份的真伪也一直是英语散文史上的一个疑案，也让研究者们为此大伤脑筋。但是这个问题比起《亚瑟王之死》这部作品的价值来，已经显得不重要了。这本书是历史上有关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传奇的集大成者，也是对中世纪“骑士精神”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总结。有关亚瑟王和他的城堡中的圆桌、寻找圣杯、梅林魔法、不忠的骑士与王后私通等浪漫传奇，都在作者现实的笔触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像是在娱乐中告别一个勇武、忠信、缠绵的旧时代，迎来一个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的新时代。对于英语散文史，这部《亚瑟王之死》也是一座里程碑。马罗礼的叙事平铺直叙，形象而准确。他善用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地道的单音节词，尽量用简明的线性短句子或并列句，使叙事、对话和人物思绪浑然一体，节奏轻快而又鲜明地向前推进。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英语进一步抖落了古英语的冗余拼写和句法屈折形式，很大程度上剔除了拉丁文和法文的影响，越来越趋向突出综合表意功能，在不露声色中展示了一种活脱脱的简明英语，日趋走向早期的现代英语，并为后世的詹姆斯《圣经》翻译和18世纪的中间体（middle style）英语散文风格奠定了基调。有趣的是，半个世纪后，来自北方的“学院派”学者、“英语纯洁运动”的提倡者罗杰·阿谢姆（Roger Ascham, c. 1515-1568）对《亚瑟王之死》中表现的骑士价值观和文化理念嗤之以鼻，斥之为“这本书全部的乐趣就在于两个突出之点：明目张胆的杀戮和胆大妄为的淫乱”。<sup>19</sup>但是，阿谢姆的英语散文理念，却

18 Coleman, T. W. *English Mystic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1938.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4.

19 Morley, Frank. *Literary Britain: A Reader's Guide to Its Writers and Landmark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0.

是与《亚瑟王之死》的简明纯洁英语一脉相承的。(参见本书第34~36页有关阿谢姆语言风格的论述)

15世纪末的英语在这些散文作家手中已经运用自如,就连一生官场沉浮,在腥风血雨的“玫瑰战争”中几乎掉了脑袋的大法官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 c. 1385-1479)到了晚年也完全抛开写了一辈子的拉丁文,转用英语写起政治和法律史,而且写得十分得心应手。他的名著《英格兰的统治》(*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有思想的力度,读来促人深思。作者在书中尽量使用本色的英语词汇,在一系列传统的短小句子中把复杂晦涩的政治法律问题讲述得简单易懂,使之成为本色的中古英语散文的典范之作。

这里,还应提及经院派学者雷金纳德·皮科克(Reginald Pecock, c. 1395-c. 1461)的论辩体散文风格。皮科克高扬人的自然理性判断和自然法则,认为“罗拉德派”与教会的争论都是皮相之论,都未接触到根本的“上帝之法”。他的文章秉承意大利神学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c. 1224-1274)经院哲学的思辨风格,而且自然理性,高度抽象。在他用英语写的《基督教的原则》(*The Rule of Christian Religion*)和《信仰论》(*The Book of Faith*)等著述中,英语散文风格走向另一端。他的句子冗长,在众多对偶词汇的簇拥下沉重地向思维的逻辑终点推进。有时,为了思维缜密,句中不惜置入多重插入语,让人读来费解。这样的英语散文风格不自觉地又落入了拉丁化的窠臼之中,在已经成气候的英语化的散文写作进程中注定走不多远。

中古英语散文内容和风格的多样呈现,表明英语在历史的变迁中重新获得了社会地位和文化自信。它和乔叟等大诗人的创作一起,在逐步的积累中为早期现代英语散文的登台铺平了道路。

---

## 本节例文

### Magic Sword Before the Death of King Arthur

THOMAS MALORY  
(c. 1415-1471)

Then Sir Bedivere wept for the death of his brother. “Leave this mourning and weeping,” said the king, “for all this will not avail me, for wish thou well that I might

live myself, the death of Sir Lucan would grieve me evermore; but my time runs fast.” Therefore, said Arthur unto Sir Bedivere, “Take thou Excalibur, my good sword, and go with it to yonder water side, and when thou comest there I charge thee throw my sword in that water, and come again and tell me what thou there seest.” “My lord,” said Bedivere, “your commandment shall be done, and lightly bring you word again.”

So Sir Bedivere departed, and by the way he beheld that noble sword, that the pommel and the haft was all of precious stones; and then he said to himself: “If I throw this rich sword in the water, thereof shall never come good, but harm and loss.” And then Sir Bedivere hid Excalibur under a tree. And so, as soon as he might, he came again unto the king, and said he had been at the water, and had thrown the sword in the water. “What saw thou there?” said the king. “Sir,” he said, “I saw nothing but waves and winds.” “That is untruly said of thee,” said the king, “therefore go thou lightly again, and do my commandment; as thou art to me lief and dear, spare not, but throw it in.”

Then Sir Bedivere returned again, and took the sword in his hand; and then him thought sin and shame to throw away that noble sword, and so eft he hid the sword, and returned again, and told to the king that he had been at the water, and done his commandment. “What saw thou there?” said the king. “Sir,” he said, “I saw nothing but the waters up and waves sweep.” “Ah, traitor untrue,” said King Arthur, “now hast thou betrayed me twice. Who would have weened that, thou that hast been to me so lief and dear? And thou art named a noble knight, and would betray me for the richness of the sword. But now go again lightly, for thy long tarrying putteth me in great jeopardy of my life, for I have taken cold. And but if thou do now as I bid thee, if ever I may see thee, I shall slay thee with my own hands; for thou wouldst for my rich sword see me dead.”

Then Sir Bedivere departed, and went to the sword, and lightly took it up, and went to the water side; and there he bound the girdle about the hilts, and then he threw the sword as far into the water as he might; and there came an arm and a hand above the water and met it, and caught it, and so shook it thrice and brandished, and then vanished away the hand with the sword in the water.

*Le Morte d'Arthur*, 1485

## 亚瑟王死前神剑显灵

托马斯·马罗礼 (c. 1415-1471)

于是，贝狄威尔骑士为兄弟之死恸哭不已。亚瑟王说：“不要再哀伤，不要再哭泣，这些对我都无济于事了。你心里多么希望我活下去，而卢肯骑士的死只会让我更悲伤。不过我在人世的时间不多了。”因此，亚瑟王就对贝狄威尔骑士说：“你快去把我的断钢之剑取来，那是我的宝贝，然后拿着它到对面的河边。到达之后听我的，把这剑扔进水里，然后回来报告我，你都看到了什么。”贝狄威尔答道：“王上，您的旨意即刻办到，我一会儿就回来复命。”

贝狄威尔说罢就离去，他在半途看了看这把高贵之剑，但见剑柄和圆头上都镶满了珍贵的宝石，于是自言自语道：“把这么宝贵的剑扔到河里，一点好处也没有，不过就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已。”于是他就把这宝剑藏到一棵树下，然后尽快返回禀报亚瑟王，说他到了水边，把剑扔到了河里。“那你看到些什么？”亚瑟王问道。贝狄威尔答道：“王上，除了看到风浪，什么也没有。”“你说的是假话，”国王说道，“所以快快再去，照我的吩咐做，把宝剑扔到水里。你我亲密无间，又何必不舍一把剑呢？把它扔进水里就是了。”

于是，贝狄威尔又拿着剑回到河边，但还是觉得把这么珍贵的宝剑扔掉，既不体面也是罪过。于是他又把宝剑藏了起来，然后回来禀告，说他到过水边，按照指令把剑扔了。亚瑟王问道：“那么你在那儿看到什么了？”贝狄威尔答道：“王上，除了风浪起伏，并无他见。”亚瑟王闻言喝道：“啊，你这不忠的叛逆！如此两次背叛我！谁能想到，一直对我亲密仰慕的你，还算是一个高贵骑士的你，竟然贪图珠宝之剑而背叛我！也罢，你速速再去，耽误这么久了，让我生命危在旦夕，我已经感到一些冷意袭来。如果你现在不按我的旨意去做，而是为了我那宝剑看着我死去，那么如果让我再看到你，我就亲自用这双手一刀杀死你！”

贝狄威尔闻言奔向宝剑，慌忙抓起，急忙向河边奔去。到达水边，他用腰带缠住剑柄，然后用尽气力把宝剑向远处的河面掷去。但见水面上伸出一只胳膊，一手接住宝剑，抖动三次，在空中挥舞，然后连手带剑消失在河水之中。

译自《亚瑟王之死》(1485)

\*\*\*

## 第七节 卡克斯顿：印刷术和早期现代英语的开端

15 世纪见证了早期现代英语散文的开端。这与英国的印刷术的兴起有着直接的联系。1476 年，威廉·卡克斯顿 (William Caxton, c. 1422-1491) 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南面不远的街面上创办了英国有史以来第一家印刷作坊，为即将到来的 16 世纪文艺复兴中的英语散文勃兴做好了文化传播上的准备。

如前所述，英语作为大不列颠岛上的本族语言，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沧桑，几经沉浮，在与外来语的交汇中纳入丰富的能量。到了 16 世纪的前夜，中古英语的各大方言以东中部的“伦敦方言”为中心逐渐汇合，最终成为英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主要语言。民族标准共同语的形成成为英语散文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语言文化的根本基础。

恰恰此时，卡克斯顿的印刷作坊在伦敦开业，招募学徒用手动印刷机印制对开本的



书籍。卡克斯顿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一直在欧陆打拼，直到五十多岁才回到伦敦开始这项载入英国史册的事业。卡克斯顿的功绩首先在于，他直接采用当时已经开始成为主流的“伦敦方言”作为标准语言，对所印刷的书籍进行主动的编辑和修订。这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当时拼法各异、互不相通的各地区的英语方言。这样，获得重生的英语成为标准书面语言，通过贵族精英的阅读和传播，开始以书媒的形式逐渐进入普通读者大众的阅读，起到了现代民族共同语言的作用。这样的信息传播革新，来得的确是时候，使文化的传播有了现代社会的气息。有了印刷传媒，此后16世纪逐渐增多的科学、哲学、政论、诗歌、小说、游记、信件等题材或体裁的文章有了传播媒体的依托，一种“标准”的书面英语载负着外来的新思想和知识流向全国，在贵族、城市商人阶层，乃至下层市民中培养了日益增多的现代英语读者。

卡克斯顿本人不仅用英语翻译了大量的书籍，也从事散文写作。他的英语散文主要见于他为所刊印而书写的序言和编后记。其所印之书以经典为主，行为手册次之，以道德教化，劝人“扬善弃恶、修身养德、成就功名”为宗旨。不过，卡克斯顿的英语散文写得一般，词汇句法都深受法语影响，有时文中照搬外来语成分，造成双语混杂。而且，为了培养商人阶层读者“高雅”的阅读习惯和贵族意识，他在翻译和写作过程中大胆采用外来词，刻意展示修辞。他还喜用同义反复，反倒使句子拖沓滞重，含混重复。但也正是这样的英语，丰富了早期现代英语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伊丽莎白时代散文的绮丽文风。

卡克斯顿十几年间一共印刷了约一百种书籍，其中也有他本人译自法文的书。那个时候的他，当然看不到印刷出版业将对现代文化传播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因此每种书的印数也只有百余册。他在出版序言和编后记中也再三说明他的读者对象主要是“高贵之人、智慧之人、大人物、绅士，还有商人”<sup>20</sup>云云。到卡克斯顿逝世时，他已经印刷出版了万余册各类英语书籍。卡克斯顿之后，印刷业开始了市场竞争，不少新的印刷坊在圣保罗大教堂北面不远处的“小不列颠”地区开张营业。当时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激烈，印刷业对此起到推动的作用。印刷业主约翰·戴（John Day）就是突出的例子。这位坚定的新教徒险些被“血腥女王”玛丽绑到火刑柱上烧死。经新登基的伊丽莎白女王赦免后，他继续致力于新教宣传，于1563年用大众化的英语把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约翰·福克斯（John Foxe, 1516-1587）的近两千页的大书《殉教圣徒书》（*The Book of Martyrs*）印制出版。此书不断扩充，多次再版，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此等文化氛围中，英语散文进入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上层读者群逐渐形成，社会阅读欲望见长。

---

20 Crotch, W. J. B., ed. *The Prologues and Epilogues of William Caxt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历史上的这些英语散文作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卡克斯顿，都是文学史家所谓的“自觉的散文文体家”，都有创造一种散文风格的自觉。这是写作个性的表现。这些散文作家走到16世纪前夜，产生了对语言自觉的审视和文体创造的欲求。这是一种隐约的形式美的追求。这样的个性化趋向，正好遇到来自欧陆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风，加之英国伊丽莎白时代实行宗教妥协，国家逐渐强盛，社会愈发稳定，于是就生出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绮丽的文风和百花齐放的文学盛况。

---

## 本节例文

### A Printer's Preface

WILLIAM CAXTON  
(c. 1422-1491)

After that I had accomplished and finished divers histories, as well of contemplation as of other historical and worldly acts of great conquerors and princes, and also certain books of ensamples and doctrine, many noble and divers gentlemen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came and demanded me, many and oft times, wherefore that I have not do made and imprinted the noble history of the Sangreal, and of the most renowned Christian king, first and chief of the three best Christian and worthy, King Arthur, which ought most to be remembered among us Englishmen tofore all other Christian kings. For it is notoriously known through the universal world that there be nine worthy and the best that ever were. That is to wit three paynims, three Jews, and three Christian men...

Then all these things foresaid alleged, I could not well deny but that there was such a noble king named Arthur, and reputed for one of the nine worthy, and first and chief of the Christian men; and many noble volumes be made of him and of his noble knights in French, which I have seen and read beyond the sea, which be not had in our maternal tongue, but in Welsh be many and also in French, and some in English, but nowhere nigh all. Wherefore, such as have late been drawn out briefly into English I have after the simple conning that God hath sent to me, under the favour and correction of all noble lords and gentlemen, emprised to imprint a book of the noble histories of the said King Arthur, and of certain of his knights, after a copy unto me delivered, which copy Sir Thomas Malory did take out of certain books of French, and reduced it into English. And I, according to my copy, have done set it in imprint, to the intent that noble men may see and learn the noble acts of chivalry, the gentle and virtuous deeds that some knights used in those days, by which they

came to honour; and how they that were vicious were punished and oft put to shame and rebuke; humbly beseeching all noble lords and ladies, with all other estates, of what estate or degree they be of, that shall see and read in this said book and work, that they take the good and honest acts in their remembrance, and to follow the same. Wherein they shall find many joyous and pleasant histories, and noble and renowned acts of humanity, gentleness, and chivalry. For herein may be seen noble chivalry, courtesy, humanity, friendliness, hardiness, love, friendship, cowardice, murder, hate, virtue, and sin. Do after the good and leave the evil, and it shall bring you to good fame and renown. And for to pass the time this book shall be pleasant to read in; but for to give faith and belief that all is true that is contained herein, ye be at your liberty; but all is written for our doctrine, and for to beware that we fall not to vice nor sin, but to exercise and follow virtue; by which we may come and attain to good fame and renown in this life, and after this short and transitory life...

“Preface to *Le Morte d'Arthur*”, 1485

## 出版序言

威廉·卡克斯顿 (c. 1422–1491)

余已刊印诸种往事史略，其间也虑及其他王道之言、霸业之术、警世治乱之书。如此，英格兰一国之内，王公贵族及各界人士纷至沓来，皆谓余何不刊行亚瑟王追寻圣杯之伟业奇事，盖因亚瑟王乃基督教王者之冠，其声名居三位世间称道之基督教圣人之首，当为英国人缅怀效仿之至上楷模。有史以来，凡经三位异教王、三位犹太王、三位基督教王。此九王者，聪慧过人，才德兼备，世人尽知……

前述即备矣。如是观之，史上确有此名为亚瑟之贤明之君，其位尊九王之列，基督教王中之冠，余对此深信不疑。亚瑟王及其忠勇骑士之事迹，本国英文鲜有刊出，而法文刊行诸本，多有记载。余曾居欧陆，有幸睹其书而拜读之。坊间多见威尔士文本，法文版次之，尚有少量英文文字记载，但均不完整。是故，余当初既得亚瑟王史略英文草本，蒙上帝所赐之浅陋之术，不负众位高人雅士之错爱及赐教，谨此刊印亚瑟王及其骑士若干事略一册。此书原稿底本为法文版，系托马斯·马罗礼爵士用英文择要而述。余以此为本，制版而刊印之。余印此书，欲彰显古代骑士之精神、豪侠之义举，尽显骑士得以成名之优雅风范和才德品行，使世人效行而趋礼，使恶行必受惩戒并遭人唾弃。余在此伏乞各位高人韵士、夫人淑女，不论地位尊卑，得此书而惠读之，心得其间之高尚德行并效行之。观此书，人间逸闻趣事、善行伟业、优雅之礼、骑士精神，足以愉悦各位读者。君不见，书中可见骑士侠迹、宫廷礼仪、世故人情、亲友之情、艰难困苦、风花雪月、故友情谊、懦弱、凶杀、嫉恨、德操、罪孽云云。行善而避恶，善莫大焉。此外，闲暇而读此书，足可怡情。而若论书中所呈之是非真伪，则各位尽可各随其便，所见各异。不论若何，本书旨在扬善弃恶，终以修身养德，成就功名……

译自《〈亚瑟王之死〉序》(1485)